

资本主义制度再平衡：全民基本收入的理念与实践

赵柯李刚

内容提要：近年来，全民基本收入已成为西方学界和政界的一股新的政策理念思潮。本文对全民基本收入思想的起源与发展、制度实践和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当前全民基本收入从学术理念到成为政策选择，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加剧、民粹势力兴起，以及科技革命即将带来的大量失业的前景下进行的一次制度“再平衡”，试图缓和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之间、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内在张力。全民基本收入制度也面临高昂财政负担、道德风险等问题，一些国家已经通过制度试验对其进行改进。在此过程中，全民基本收入也产生了多样化的过渡性制度形态，这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自我修复和变革的新方向。

关键词：全民基本收入 不平等 效率 经济增长 资本主义制度

引言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次全面冲击，在许多西方社会精英看来，他们进入了一个没有安全感的时代。^① 伴随着危机而来的是经济增长的疲弱、劳动生产率和社会流动性的停滞，以及人口和技术变化引发的民众对未来的恐惧。上述种种在政治上转化为民众的愤怒情绪及对精英群体的不信任，更多的民众

^① Nemat Shafik, “A New Social Contract: Overcoming Fears of Technology and Globalization Means Rethinking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Citizenship,” *Finance & Development*, IMF, December 2018, p.4.

开始支持民粹主义和强人政治。^① 传统观点往往将西方国家面临的困境归咎于全球化和技术本身,而新一轮的反思则认为根源在于目前的社会契约——国家与公民之间、公民与公民之间的权利与义务——运转失灵,无法管控全球化和技术发展带来的影响,无法给予民众安全感和信心,解决途径在于重签社会契约,重新确立国家与公民之间、公民与公民之间的相互责任。^② 在此背景下,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受到了西方学术界和政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从象牙塔里乌托邦式的社会构想,变成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选择。作为一项激进的改革措施,全民基本收入旨在校准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之间新的均衡点,在平等与自由之间建立新的连接,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再平衡”。

一 全民基本收入的思想起源与发展

全民基本收入的基本内涵是政治共同体支付给所有成员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一项收入,以个人为基础,没有经济状况审查、工作或性别要求,^③是最高水平的、在经济上可行且具有可持续性的全民无条件转移支付。^④ 2016年6月5日,瑞士就实施“全民基本收入”举行全民公投,强调全民基本收入将让全体民众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并确保大家“都能参与到公众生活中来”。^⑤ 虽然被否决,但这是一次通过政治程序将全民基本收入这一学术理念变为现实制度的尝试,在全球范围引发了对全民基本收入的广泛讨论。

全民基本收入并非全新的政策理念,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但其思想渊源并非一成不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理论作为支撑。总体而言,社会公平理念、对提高经济效率的增长模式的反思和科技进步导致的生产关系变革是全民基本收入三个最为重要的思想来源。首先,全民基本收入思想最早产生是基于社会公平理念,是

① Nemat Shafik, “A New Social Contract: Overcoming Fears of Technology and Globalization Means Rethinking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Citizenship.”

② Ibid.

③ Tony Walter, *Basic Income: Freedom from Poverty, Freedom to Work*, Marion Boyars, 1989, p. 18; 另参见[比]菲利普·范·派瑞斯:《基本收入:21世纪一个朴素而伟大的思想》,载《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6期,第58页。

④ Philippe Van Parijs, *Real Freedom for All: What (if Anything) Can Justify Capit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35.

⑤ Raphael Minder, “Guaranteed Income for All? Switzerland’s Voters Say No Thanks,” 5 June 2016,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6/06/06/world/europe/switzerland-swiss-vote-basic-income.html>, last accessed on 5 October 2017.

为了解决当时普遍存在的贫穷和不平等问题。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在《乌托邦》一书中提出“最低收入”概念。其后,莫尔的好友胡安·卢斯·维韦斯(Johannes Ludovicus Vives)系统阐述了政府有责任给居民提供有保障的最低收入,并制定了较为详细的计划,因此被认为是“有保障的最低收入之父”。法国大革命的参与者、哲学家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Sketch for a Historical Picture of the Progress of the Human Mind)中论述了社会保险能减少不平等、不安全和贫穷。孔多塞的忠实战友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发展了他的社会保险思想,提出“基本赠予”(basic endowment)的概念。在此基础上,空想社会主义者约瑟夫·沙利耶(Joseph Charlier)和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提出了“基本收入”(Basic Income)的定义。20世纪上半叶,基本收入在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获得了一定的讨论。经济学家米勒(Dennis Milner)提出了一个按周支付的无条件收入计划,称为“国家红利计划”(Scheme for a State Bonus);工程师克利福德·道格拉斯(Clifford H. Douglas)主张保障因战争受损的英国民众的充分消费,认为应按月给每个家庭“国家分红”(national dividend);经济学家柯尔(George D.H. Cole)和詹姆斯·米德(James E. Meade)则提出了“社会分红”(social dividend)计划,认为国民有权利从国家获得维持基本生活的收入。^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吸取了战争的教训,为了避免国内社会矛盾导致的政治动荡,社会公平成为政府的政策着力点,如普遍引入资本管制措施和倾向于劳动者的收入分配原则等,国家力量大规模介入对贫困问题的解决。1968年1月,美国约翰逊总统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当时美国福利制度的替代方案,该委员会最终推荐了一项“基本收入支持计划”。在此基础上,尼克松总统主张废除以有未成年子女的单亲家庭为对象的援助项目(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实施覆盖到所有贫困人口的家庭援助计划(Family Assistance Plan)。该计划的方案是,无论家庭成员工作与否、是否拥有工作能力或者工作意愿,都可以因贫困而领取补贴。这已非常接近全民基本收入的构想,但后来因参议院反对而未能实施。1970年代,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n)提出了“负所得税”概念,被视为无条件基本收入的一种新形式。全民基本收入主张被广泛知晓则始于1980年代,为了寻找传统福利制度的改革出路,在丹麦、荷兰、英国和德国等国家,基本收入获得广泛讨论。

^① 本文对全民基本收入思想历史发展脉络的介绍,主要引自“基本收入全球网络”网站。参见“History of Basic Income,” Basic Income Earth Network, <http://basicincome.org/basic-income/history/>, 2018年3月5日访问。

1986年,比利时政治经济学家菲利普·范·派瑞斯(Philippe Van Parijs)召集成立了“基本收入欧洲网络”(Basic Income European Network),随着欧洲以外的国家越来越多地参与活动,2004年将它更名为“基本收入全球网络”(Basic Income Earth Network),目前已成为推广全民基本收入的思想大本营。^①

全民基本收入在当前之所以被广泛关注,与社会公平问题的凸显密切相关。不平等状况的恶化,加重了西方国家内部的经济社会矛盾。财富不平等导致“跑在前面的人截断了落后者追赶的道路”,^②其结果就是西方社会“1%”与“99%”阶层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③西方学术界对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深刻思考与反省逐渐在政策界引起了反响,不少国家的政府、政党也开始将全民基本收入作为一种可行的应对不平等的政策选项。2017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了新的全球财政监测报告,首次对全民基本收入在应对不平等问题上的可行性进行了评估。IMF的研究显示,如果将“全民基本收入”设定在居民收入中位数25%的水平,则在发达经济体中,其财政成本为GDP的6%至7%左右,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是3%至4%左右。IMF认为,“全民基本收入”会对所有国家的不平等带来巨大影响,将使基尼系数(衡量不平等程度的指标之一)平均下降5个百分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实施全民基本收入,也会大幅减少贫困。^④

其次,全民基本收入有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传统的经济学观点认为,公平和效率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想要更多的公平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效率,而更高的效率也必然以损失公平为代价。所以,政府始终要在公平和效率之间进行选择 and 权衡:是以效率为代价多一点平等,还是以平等为代价多一点效率。^⑤全民基本收入是国家以财政资金的方式对每个国民,无论贫富、出身和职业,以现金的方式给予相同金额的转移支付。在传统经济学看来,这显然是一种“公平优先”的政策选择,最终会以损害经济效率为代价。但近来的研究显示,平等和效率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关系,更加平等的社会有利于长期增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研究表明,基尼系数下降

① “History of Basic Income”.

② [美]安格斯·迪顿:《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崔传刚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79页。

③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认为,美国严重的贫富差距状况导致1%的富有阶层掌控了经济社会的大部分资源,美国事实上成为“1%的群体所有、所治、所享”的国家。2011年,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抗议者打出了“我们是99%”的口号。参见[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张子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

④ IMF Fiscal Monitor: Tackling Inequality, October 2017.

⑤ [美]阿瑟·奥肯:《公平与效率:重大抉择》,王奔洲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

1个百分点,将会给GDP带来平均每年0.15%的增长。1985-2005年间,19个OECD国家基尼系数平均上升了2个百分点,这导致其经济增长在1990-2010年间损失了4.7%。^①不平等导致的财富急剧集中会抑制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创造性破坏”,^②同时还会损害社会的凝聚力,侵蚀青年人的信心和希望,^③最终成为长期增长的巨大阻碍。具体而言,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④第一,削弱了人力资本的积累。贫富差距的拉大抑制了低收入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这不仅减少了个人的发展机会,还导致高技能人力资本的缺乏,进而降低经济增长的潜力;第二,减少了投资。由于资本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低收入者因缺乏抵押物而无法有效地证明自己的偿还能力,所以无法进入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也就导致其无法投资有利可图的项目,实际上降低了社会投资总额;第三,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一方面,不平等会导致政治动荡,降低投资者的信心;另一方面,不平等所造成的购买力不足往往会导致消费信贷扩张,家庭债务加重,过度的负债会引发危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近几年发布的一系列政策报告中鼓励各国政府采取措施来应对日益增长的不平等,认为社会越不平等,经济增长就越慢、越脆弱,而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持久推动力。IMF认为,希望用加快增长来自自然地消除不平等是一种错误的想法。财政政策对减少不平等至关重要,在发达经济体,直接税和转移支付使收入不平等程度平均降低了三分之一左右。其中有四分之三是通过转移支付来实现的。IMF的实证研究显示,没有证据表明实施适度再分配对增长有不利影响,反而严重的不平等会损害增长,因为它会提高医疗和教育资源的获取门槛,特别是危及社会凝聚力,而社会凝聚力是社会面对冲击时能够及时应对的关键。IMF的研究在数据中只抽取了税收、补贴等直接再分配措施的样本,如果将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具有再分配性质的财政支出包括在内,再分配对增长的积极影响将更为明显。由此,IMF的政策结论是:适度提高再分配力度对增长的负面影响不大,并且长期来看,它将增加收入分配的平等性,反过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⑤正是在西方国

① *In It Together: Why Less Inequality Benefits All*, OECD, 2015, p.67.

② [美]安格斯·迪顿:《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第279页。

③ [法]克里斯蒂娜·拉加德:《被推迟的梦想:欧洲的代际不平等和贫困》,2018年1月24日,IMF, <https://www.imf.org/external/chinese/np/blog/2018/012418c.pdf>, 2018年10月2日访问。

④ Philippe Aghion et al.,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Growth Theo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37, No.4, 1999, pp.1621-1630.

⑤ Jonathan D. Ostry et al., "Redistribution, Inequality, and Growth,"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No.14/02, 2014, IMF; Era Dabla-Norris et al.,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Income Inequality: A Global Perspective,"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No.15/13, 2015; IMF, *IMF Fiscal Monitor: Tackling Inequality*, October 2017.

家重新定义、反思平等与增长之间关系的背景下,全民基本收入作为一项大胆而激进的再分配制度,进入了民众与精英的变革视野。

再次,当前科技进步导致的生产关系变革,使全民基本收入具有了新的政策价值。早在1930年,凯恩斯就曾警告,人类会受到一种新疾病的折磨,就是“技术进步引发的失业”,因为人类发现节约使用劳动力办法的速度远远超过为劳动力开辟新用途的速度。^①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正在使凯恩斯的预言成为现实的可能性不断增大。虽然技术进步对就业可能同时具有负向的抑制效应和正向的创造效应,^②但人工智能使其对劳动力的替代达到了一个过去无法比拟的速度和规模,^③劳动力市场前景黯淡,可能更多归因于科技发展而非全球化,^④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工作岗位易受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影响。未来20年,美国高达47%的就业岗位、英国和欧洲约40%的就业岗位,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更高比例的就业岗位,都可能被机器取代。计算能力和机器学习的指数级增长将加剧工作岗位的脆弱性。^⑤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专家杰瑞·卡普兰认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进展会以两种基本的方式搅乱劳动市场:首先是大部分自动化作业都会替代工人的劳动,从而减少工作机会;其次是科技进步让商家重组和重建运营方式,这不仅会淘汰工作岗位,也会淘汰技能。他还强调,无论什么领域的工作,自动化都会毫不留情。^⑥

新技术可能会导致“赢者通吃”市场的崛起——少数成功人士、企业和产品主导了世界经济,^⑦且不会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机器开始取代人工后,很多企业的盈利能力会大大增强,产生的财富也相应地转移到企业所有者手中。^⑧这会让劳动市场发生颠覆性的变革:由传统的劳资双方为主体变为以技术、资本精英和人工智能机器人为主体,大量的劳工会被完全“挤出”劳动力市场,被彻底隔离在基于新技术的工业生产体系之外。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基石,如果这一“基石”

① [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劝说集》,李井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1页。

② Philippe Aghion and Peter Howitt, “Growth and Unemployment,”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61, Issue 3, 1994, pp.477-494; Christopher A. Pissarides, *Equilibrium Unemployment Theory* (Second Edition), MIT Press, 2000.

③ 曹静、周亚林:《人工智能对经济的影响研究进展》,载《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1期,第106页。

④ 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Global Risks Report 2017,” http://www3.weforum.org/docs/GRR17_Report_web.pdf, last accessed on 1 March 2018.

⑤ [英]伊恩·戈尔丁:《全民基本收入为何行不通?》,2018年2月20日,FT中文网,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6387>, 2018年2月28日访问。

⑥ [美]杰瑞·卡普兰:《人工智能时代》,李盼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6-127、140页。

⑦ [英]马丁·沃尔夫:《技术带来的七大变化》,2016年1月22日,FT中文网,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5881>, 2017年12月1日访问。

⑧ [美]马丁·福特:《机器危机》,七印部落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页。

被彻底动摇,那么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也将面临重组,这一过程很可能充满政治动荡与高度的不确定性。正因为如此,全球众多高科技领域的商界精英都支持全民基本收入的理念和实践,因为它不仅仅是解决生活水平停滞或下降的方法,并且还提供了一条途径,可以把“劳动力”与“工作”不可避免地分离,从一种压迫性和不稳定的过程,转变为让人们获得解放的选择自由。^①

准备参加美国 2020 年总统大选的纽约商人杨安泽(Andrew Yang)认为,特朗普能够当选总统是因为自动化使密西根、俄亥俄、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州失去了 400 万个工作岗位,选民资料显示一个地区制造业自动机器愈密集,投给特朗普的选票就愈多。他提出“自由红利”(Freedom Dividend)计划,每个月发 1000 美元给每一位 18 岁至 64 岁的美国人,不论其是否有工作和收入,让每个人至少能维持基本的稳定生活。^② 这实质上就是建立全民基本收入制度。

二 对全民基本收入的争论:赞同还是反对?

围绕全民基本收入进行争论的焦点问题主要包括:是否能够维护社会公平?高昂的成本能否承担得起? 是否能够提高经济效率? 是否会产生新的不平等? 是否会引发道德风险?

赞同者的第一个观点认为全民基本收入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因为自由对资本主义而言具有首要性,自由为资本主义的存在提供了最为根本的合法性基础。但现实中,资本主义社会却充斥着不平等,并严重损害了自由,致使资本主义在其根基处岌岌可危。^③ 而全民基本收入能够将资本主义“向前推进一步”,使之成为一个“自由社会”,重建资本主义的合法性。^④ 如派瑞斯认为,一个正义的社会就是每一个人不仅有权利做他想做的事,而且拥有“做”它的手段。不仅如此,获得这些手段的机会应该按“最少最大化”的原则来分配,即向那些目前拥有最少机会的人提供最大可能的现实

^① Andy Stern and Lee Kravitz, *Raising the Floor: How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Can Renew Our Economy and Rebuild the American Dream*, Public Affairs, 2016, pp.188-190; [英] 马丁·桑德布:《如何靠全民基本收入重建美国梦?》,2016年7月7日,FT中文网,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8337>, 2018年3月6日访问。

^② Kevin Roose, “His 2020 Campaign Message: The Robots Are Coming,” 10 February 2018,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8/02/10/technology/his-2020-campaign-message-the-robots-are-coming.html>, last accessed on 6 March 2018; 《华人杨安泽欲参选美国总统 关注自动化社会风险》,2018年2月14日,欧洲时报网站, <http://www.oushinet.com/qj/qjnews/20180214/284490.html>, 2018年3月6日访问。

^③ 参见梁豪、刘科:《真实自由、资源平等与基本收入——派瑞斯无条件基本收入方案的政治哲学维度》,载《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52页。

^④ Philippe Van Parijs, *Real Freedom for All: What (if Anything) Can Justify Capitalism?* pp.1-2.

机会。^① 社会正义不仅是收入的权利问题,而且是社会参与和机会平等的问题。最有效的兼顾收入和社会参与的方法是无无论个人行为如何,通过全民基本收入这种积极福利,使其由被迫的失业状态变为低收入的积极工作状态。全民基本收入“无条件”的特点就具有至关重要的优势:它(可持续地)使得弱势群体获得谈判能力,使他们能够识别有吸引力的或有前途的工作和那些不体面的工作,^②增强他们自由选择的能力。

赞同者的第二个观点认为全民基本收入能够提高经济效率。首先,相比传统的社会保障,全民基本收入可以提高工作积极性。例如,在当前社保体制下,最低生活保障领取者往往对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不太积极,因为他们再就业后赚取的工资达到一定金额后,就会被取消继续领取低保的资格。因此,他们会寻找工资少于或等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工作并从事最低限度的劳动,^③但基本收入没有这些约束,能够使劳动者更加积极地参加工作。^④ 其次,全民基本收入可以保障选择职业的自由,使劳动者不用为谋生而工作。^⑤ 这不仅可以提高劳动者在找工作时的谈判议价能力,还会鼓励他们冒险去做一些具有挑战性和创新性的工作。^⑥ 而且,那些报酬较低,却对社会至关重要的工作,如幼教、护理、青少年辅导等将变得更有吸引力。在没有谋生压力的情况下,就业市场将真正达到供需平衡。^⑦ 再次,在生存压力下,人们将不得不从事自己没有内在激励的工作,而被迫放弃那些真正发挥自身潜能的工作。这种潜力和兴趣与实际工作岗位的不匹配,是一种对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通过消除对“我们将如何生活”的担忧,全民基本收入刺激了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企业家精神。

赞同者的第三个观点认为全民基本收入可以降低行政成本,提高福利制度的有效性。欧盟委员会的研究报告显示,荷兰各种家计调查型福利的领取率在72-81%之间,葡萄牙为72%,法国在65-67%之间,芬兰在50-60%之间,奥地利为44%,德国为33%,爱尔兰为30%。^⑧ 福利金未被领取的情况广泛存在,引发了人们对基于家计调

① 余文烈:《西行访谈录——范帕里斯的社会成员“基本收入”理论》,载《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0期,第72页。

② [比]菲利普·范·派瑞斯:《基本收入:21世纪一个朴素而伟大的思想》,第62页。

③ 参见金炳彻:《基本收入的学理构思与模型研究》,载《社会保障评论》,2017年第2期,第36页。

④ Philippe Van Parijs, *Competing Justifications of Basic Income, Arguing for Basic Income*, Verson, 1992, pp.3-11.

⑤ Daniel Raventós, *Basic Income: The Material Conditions of Freedom*, Pluto Press, 2007, p.22.

⑥ Andy Stern and Lee Kravitz, *Raising the Floor: How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Can Renew Our Economy and Rebuild the American Dream*, pp.188-190.

⑦ 《不劳而获? 瑞士将对基本收入办公投》,2016年2月2日,德国之声中文网, <http://p.dw.com/p/1HnYF>, 2018年11月10日访问。

⑧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Social Situ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2008*, pp.42-43.

查机制的传统福利制度的严重质疑。首先,收入评估的复杂性阻碍了人们领取福利金;其次,家计调查会侵犯个人生活状况的隐私,领取福利金往往被视为失败的标志,与人性尊严的理念相悖,这是造成福利资金利用率低的重要原因。全民基本收入则因其“无条件性”“全民性”以及领取方式的“单一性”解决传统福利制度面临的这些难题。此外,由全民基本收入取代所有名目繁杂、手续烦琐的社会福利项目,不仅将大大降低行政成本,包括所有社会福利管理部门的运行支出,还可以有效地避免寻租行为的发生。

赞同者的第四个观点认为全民基本收入可以更好地应对科技进步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的变革。尽管“科技进步带来大量失业”在相当大程度上仍是一种前景预测,属于“远虑”,但技术正在改变人们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条件。例如,数字技术正在催生更多的短期工作,或者说“零工”。根据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的数据,逾1.6亿西方人如今在所谓的零工经济(gig economy)中工作,数倍于5年前的人数,其中约三分之一是“出于需要”这么做。^①技术的发展使得正式工作和非正式工作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但当前社会保障制度仍以正式的长期雇佣合同为基础,显然不能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由技术引起的工作性质的变化,使劳动者从向雇主要福利的模式转变为向国家要福利的模式,^②而全民基本收入正是在国家与个体劳动者之间建立起了直接的责任关系,契合了劳动力市场转型带来的对社会保障的新需求。

全民基本收入的反对者则认为,这项制度具有难以克服的局限:第一,全民基本收入会产生新的社会不公。经合组织的研究发现,实施全民基本收入将会增加税收、减少现有福利,并且对减少贫困并非有效。因为现有社会保障体系有专门针对穷人的保障,如果这些被单一的转移支付取代,而财政投入规模保持不变,穷人得到的保障水平则会低于贫困线水平。而如果以最低收入保障水平支付全民基本收入,则意味着需要大幅提高税收。这对大多数人而言,税负会增加,并将进一步提高目前经合组织国家已然很高的税负水平。根据经合组织的研究数据,在意大利和芬兰,按国家现有最低收入保障水平支付基本收入将导致国家预算节省而不是增加,即在事实上减少政府的保障投入。发达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差异很大,在未精准定位贫困家庭的基本收入制度下,英国、法国和芬兰以及很多其他国家的贫困水平将会上升,而意大利的贫困水平将

^① [英]爱德华·卢斯:《西方自由主义的困境》,2017年5月25日,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2732?adchannelID=&full>,2018年7月20日访问。

^② Michal Rutkowski,“Reimagining Social Protection,”*Finance & Development*, IMF, December 2018, pp.10-13.

保持不变。这一过程会明显地区分这一制度的赢家(gainers)和输家(losers)。提高税负水平,最富有的群体受影响较小,因为他们的税负本来就很高,中产阶级则要支付更多税赋,而获得的基本收入所得并不能抵消这部分税赋支出,新的贫困群体和不满群体就此产生。^①

第二,全民基本收入引发道德风险,降低经济效率。全民基本收入破坏了惯常的劳动伦理:一个强壮的人不应其他人的劳动为生,全民基本收入为懒人剥夺勤劳人提供了理由。^②在这种观点看来,个人通过工作获得的不仅是收入,还有意义、地位、技能、人脉和友谊。让收入和工作脱钩,同时奖励人们待在家里,正是社会衰败的原因。犯罪、毒品、家庭破裂及其他具有社会破坏性的结果,更有可能出现在失业率高的地方。^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强调,将有针对性的转移支付(如失业、伤残或住房补贴)的福利支出,通过普遍的转移支付重新分配给每个人,结果是最需要的人群得到的补贴减少了,亿万富翁们得到的补贴增多了。此外,全民基本收入会导致劳动力供应不足。因为它可能会削弱人们参与社会工作的意愿,导致过多人依赖基本收入而不愿劳动,或者边际税率太高以至降低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④如果大家都“想干才干”,某些产品和服务将不复存在,甚至没有人愿意好好工作。“有些重要的工作就是只有在金钱激励的前提下才会有人去做”。^⑤

第三,全民基本收入成本巨大。多数严重依赖所得税的发达国家发现,政治上很难对财富税做太大变革,如果对企业利润征税太高,会面临把投资者推向对手国家的风险。^⑥全民基本收入在增加劳动者讨价还价能力的同时也会导致雇主赋税负担增加、劳动力价格上涨、生产成本上升、雇主放弃投资或转移资本等问题,还会带来移民、税收增加等风险。牛津大学教授伊恩·戈尔丁(Ian Goldin)认为,全民基本收入在财政上是不负责任的,即便是在最富裕的社会,如果全民基本收入被设定在一个提供适中但体面生活标准的水平,那也是无法承受的,这将导致不断膨胀的财政赤字。填补全民基本收入预算的黑洞,需要进一步提高税率或者从健康、教育等其他领域重新分

① OECD,“Basic Income as a Policy Option; Can It Add up?” <https://www.oecd.org/els/emp/Basic-Income-Policy-Option-2017.pdf>, last accessed on 1 August 2018.

② 余飞跃、邱伟华:《公民收入——福利国家改革的一种设想》,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9年第4期,第118页。

③ [英]伊恩·戈尔丁:《全民基本收入为何行不通?》。

④ 余飞跃、邱伟华:《公民收入——福利国家改革的一种设想》,第118页。

⑤ 《不工作 白拿钱 芬兰人想要试一试》,2016年12月31日,德国之声中文网, <http://p.dw.com/p/2V11A>, 2017年11月10日访问。

⑥ 《FT社评:机器人税有道理》,2017年2月22日,FT中文网,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1480>, 2018年3月2日访问。

配资源。^① 詹姆士·托宾(James Tobin)曾提出一个税收公式:如果政府需要征收 $x\%$ 的税用于其他管理事务的费用支出,当发放的全民式补助为平均收入的 $y\%$ 时,这就意味着需征收的税率将提高为 $(x+y)\%$ 。^② 这一公式很好地说明了政府在推行全民基本收入时面临的权衡问题:基本收入的水平越高,国民的税负就越重,而过高的税负反而会损害国民实际能够享受到的福利水准。

同时,反对者认为,孤立的全民基本收入制度并不能解决问题。尽管全民基本收入优于原来发放失业救济金的政策,但给老百姓钱只能是个“临时补丁”。比全民基本收入——其核心是个体——更重要的是提供全民基本服务(universal basic service),虽然以社会共同保障来应对超出个人控制的大规模冲击这一概念肯定是正确的,但如果忽视提供这种保障的背景是个体有实现自我的需要,那么这种保障就是无效的。如果机器人将抢走数百万个工作岗位,就算国家给所有人发放基本收入,但缺乏繁荣的经济中应有的公共服务体系,那也是无济于事的。^③

总体而言,全民基本收入是否可行在理论上还难以达成一致,但已有一些国家开启了全民基本收入的制度试验,以“干中学”的方式通过政策实践来弥合思想的分歧。

三 全民基本收入的政策实践与探索

全民基本收入虽然是一种激进的社会改革措施,但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始尝试,或者在主流政治辩论中认真审议其实施的可能性。根据转移支付的覆盖范围、替代水平、支付方式和受益条件,全民基本收入的政策实践可以分为五种模式:第一种是完全的全民基本收入,即向个体的转移支付数额高于现有社会保障水平,转移支付的目的在于替代现有社会福利;第二种是部分全民基本收入,在这一模式下,转移支付的数额低于全额全民基本收入,不足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目的也不在于替代既有的福利制度;第三种是负所得税,当个人收入低于既定最低标准时,会收到由税收支撑的收入补偿;第四种是参与型全民基本收入,该模式与完全全民基本收入相类似,但有一定的条件,如受益人需要参与社区服务等;第五种是通用福利(Universal Credit),即每月

^① [英]伊恩·戈尔丁:《全民基本收入为何行不通?》。

^② James Tobin, "On Limiting the Domain of Inequality," *The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Vol.13, No.2, 1970, pp.263-277.

^③ [英]黛安娜·科伊尔:《提供“全民基本服务”才是上策》,2017年5月9日,FT中文网,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2477>, 2018年3月2日访问。

向个体转移支付一定的金额,以替代若干其他福利,具体金额由若干因素决定,如收入水平和需要照顾的儿童等。^①按照这个分类标准,目前实施或者试验全民基本收入的国家 and 地区基本没有直接引入第一种模式的,都是比较谨慎地在后四种模式中进行渐进式的探索。

作为高福利国家的典型,芬兰的全民基本收入实验备受全球瞩目。根据芬兰国家社保局计划,2016年12月31日之前,社保局在11月领取过失业金、低保金的人群中抽签产生大约2000名25-58岁之间的芬兰公民;在接下来的24个月里,他们可以获得国家无条件提供的每月560欧元的基本收入(560欧元正好是目前芬兰的失业金额),其后两年内他们将无法再获得失业金或者低保金。不过,如果他们在这段时间内找到了工作,每月560欧元的无条件基本收入也不会减少。值得注意的是,560欧元远远低于2700欧元的芬兰平均收入水平,这只是“基本收入”。芬兰进行的这项实验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失业者的再就业意愿是否会提高。许多失业者、低保户都不愿从事一些较低收入的工作,他们担心税后工资还不如失业金。社保局希望无条件的基本收入能激励失业者至少去接受一份半职工作;二是福利系统的官僚成本能否降低。在现有的社会福利体系中,当局需要花费大量人力定期核查低保金领取者的真实生活水平,不断调整低保金的金额,而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意味着发放方式的极大简化。^②芬兰的全民基本收入实验获得各国的密切关注,一方面因为芬兰是拥有世界上最完善的福利保障制度的国家之一,有较为成熟的高福利经验,具有代表性;另一方面,芬兰的实验有明确的目标导向和比较清晰的参照项,便于检验试验结果。两年期限结束后,芬兰政府不打算继续上述实验。^③目前,芬兰政府对两年期的全民基本收入实验的最终评估尚未完成,但芬兰卫生和社会事务部长皮尔科·马蒂拉(Pirkko Mattila)对该实验的初步结果进行调查后表示,根据第一年的数据,基本收入对参与者就业率的影响“似乎很小”。不过,该项目的首席研究员奥利·卡加斯(Olli Kangas)称,相比对照组,基本收入的参与者明显变得更快乐、更健康了。^④也就是说,幸福感明显提高了。

① Yuan Zheng et al., “Universal Basic Income: A Working Paper,” August 2017, UNDP China Office, p.16.

② 《不工作 白拿钱 芬兰人想要试一试》。

③ “Finland to End Basic Income Trial after Two Years,” 23 April 2018,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8/apr/23/finland-to-end-basic-income-trial-after-two-years>, last accessed on 11 January 2019.

④ “Finland’s ‘Free Cash’ Experiment Fails to Boost Employment,” 8 February 2019,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feb/08/finland-free-cash-experiment-fails-to-boost-employment>, last accessed on 11 February 2019.

意大利正在推进一项以全民基本收入为参考的贫困人群收入计划,五星运动党(Movimento 5 Stelle)一直主张全民基本收入,在其与北方联盟(Lega Nord)联合执政后在政府层面提出国民基本收入(Reddito di cittadinanza)计划。这并非完全的全民基本收入,而是有条件的负所得税。2018年12月30日,包含国民基本收入计划的2019年预算案正式通过。根据法案,申请“国民基本收入”的意大利公民和符合居留要求的外国人需要满足一定的财产条件并遵守国民基本收入的相关协议和义务。财产条件规定得非常详细,包括家庭综合年收入(ISEE,核心家庭经济收入状况评估)、根据人口数确定的家庭年收入、不动产价值、银行存款及半年内购买汽车的排量等。义务规定包括必须参加培训课程,为市政府每周免费工作8小时,拒绝就业中心提供的工作不得无故超过三次。同时,“国民基本收入”的用途受到严格限制,每一笔消费都将受到监控,只能用于最基本的消费需求。在满足上述条件的基础上,月收入低于780欧元的公民可以获得相应数额的“国民基本收入”,使月收入达到780欧元(如符合条件的月收入600欧元的申请者,将获得每月180欧元的补助)。国民基本收入计划将从2019年4月开始实施,获得“国民基本收入”最长不超过18个月,到期一个月后可以再续18个月,预计将有约130万个家庭受益。^①

荷兰从2017年开始在乌得勒支(Utrecht)等多个城市进行为期两年的全民基本收入试验,以测试无条件现金援助替代“工作福利”的情况。该试验侧重货币激励的作用,在工作后仍保留无条件现金援助。参与试验的荷兰经济学者认为,强迫工作和“工作福利”制度一样,损害人们工作和提高工作效率的内在动机,并因此减少对社会的有益贡献。^②

此外,爱尔兰、德国和英国等欧洲国家也就全民基本收入进行了政治辩论。爱尔兰对全民基本收入进行了长期的论证,并且在不久的将来极有可能引入完整的全民基本收入制度。1977年,爱尔兰国家经济和社会理事会(NESC)发布了一份关于如何整合个人所得税和福利转移的报告,基本收入是其中包含的三个选项之一。此后,基本收入多次出现在研究报告和政府政策报告中。2002年,政府出版的基本收入绿皮书

^① “Dimissioni, divorzio e giovani: tutti i requisiti per il reddito di cittadinanza,” 1 January 2019, il Giornale, <http://www.ilgiornale.it/news/economia/dimissioni-divorzio-e-giovani-tutti-i-requisiti-reddito-1623486.html>, last accessed on 17 January 2019; 《意大利“国民补贴”4月起实施外国移民住满5年可申请》, 2019年1月3日, 欧洲时报网站, <http://www.oushinet.com/europe/italy/20190103/310120.html>, 2019年1月17日访问。

^② “Overview of Current Basic Income Related Experiments (October 2017),” 19 October 2017, Basic Income Earth Network, <https://basicincome.org/news/2017/10/overview-of-current-basic-income-related-experiments-october-2017/>, last accessed on 15 January 2019.

(Basic Income: A Green Paper)指出,基本收入制度在解决贫困方面远比现行的税收/福利制度更有效。随后,爱尔兰对基本收入制度的探讨集中于可负担性(affordability)和如何实施两个问题上,并提出了三种在爱尔兰实现全民基本收入制度的可能路径:第一种是“一次性完全”(all-at-once)的方法,就是立刻取消现行相关制度,实施全民基本收入;第二种是“按群体”(by groups)的方法,逐一向社会中的某些群体(儿童、老年人等)引入基本收入;第三种是“渐进式”(gradual)的方法,在逐步建立基本收入制度的同时废除现行相关制度。这些均在爱尔兰议会得到讨论。^①

2017年3月,德国劳动与社会事务部发布了《工作4.0白皮书》,建议德国考虑引入“个人职业账户”。在该制度下,每一个年满18岁并且首次进入职场的年轻人将自动拥有一个初始金额为2万欧元的账户。这笔钱无条件归个人支配,但有特定的用途,例如教育进修、个人创业、游学休假、失业补助等,所需资金从遗产税中征收。在德国看来,数字技术的发展在重组产业链的同时,也在重新定义“工作”。不仅许多传统的工作岗位会消失,大量新涌现的工作的方式、时间、地点也更加灵活多变。这意味着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会面临新的风险,需要新的激励,工业4.0需要工作4.0的配合。^②

不仅信奉市场经济的欧洲易与全民基本收入理念产生共鸣,在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全民基本收入也收获了相当程度的支持。美国阿拉斯加州的永久基金分红制度(Alaska Permanent Fund Dividend)一直被誉全民基本收入政策实践的典范。1976年,阿拉斯加修订州宪法,确立了永久基金分红制度,资本金来源于阿拉斯加州每年的矿产资源租赁收入、拍卖所得以及州政府的联邦矿产资源所得收入。州政府每年要将至少50%的上述收入划拨到这个基金中,用基金收益给公民发放社会分红,每年为符合条件的个人提供同额度的现金。1977年,阿拉斯加州用出售石油积累下的收入正式创立了阿拉斯加永久基金,此后基金每年增加,目前已累积至600多亿美元。1982年发放了第一次分红,在阿拉斯加州连续居住半年以上的该州公民每人获得1000美元。此后,每年发放数额根据收益浮动,最少的一次是1984年发放了628美元,最多的一次是2000年发放了2533美元。基金的投资及社会分红的发放由1980年成立的国有资源永久基金公司(Alaska Permanent Fund Corporation)负责。事实证明,普遍且无条件的永久基金分红制度非常成功,获得了民众的大力支持,取得了良好的政治和社会效益。有经济学家将永久基金分红效果与用于资金和业务预算的开支

^① Richard K. Caputo, ed., *Basic Income Guarantee an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Perspectives on the Viability of Income Guarantee*,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p.107-124.

^② *Weißbuch Arbeiten 4.0*, Bundesministerium für Arbeit und Soziales, 2017.

进行了比较,认为永久基金分红方案是刺激阿拉斯加经济活动的最有效措施。但是,相对阿拉斯加州的人均收入水平,发放的补助金额较低,且每年数额多少不一,无法实现全民基本收入预想的价值。并且,这种资源红利模式有其特殊性,很难适用于一般国家通过增加税收或减少其他社会计划支出的模式。^①但阿拉斯加的永久基金分红制度给全民基本收入提供了现实的样板。

美国初创公司投资孵化器 YC 全球研究院(Y Combinator Research)在加州进行了精心设计的全民基本收入试验,以探究全民基本收入的运行机理和各方面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对解决美国极端贫困、技术性失业等问题的效果,并期待这一计划成为确立 21 世纪新社会契约的第一步。2016 年,在加州奥克兰(Oakland)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小型试验,以完善接下来的规模更大的试验。YC 全球研究院计划推出更大更长期的试验,在两个州随机选取 3000 人参与为期 3-5 年的研究,其中 1000 人每人每月将获得 1000 美元,另外 2000 人将作为对照组。参与者年龄在 21 岁至 40 岁之间,并且家庭收入不超过居住地区的中位数,且确保包括种族、性别在内的多样性。^②这项雄心勃勃的试验计划预计在 2019 年实施。^③这将是极具代表性的全民基本收入试验。此外,美国加州斯托克顿(Stockton)正在进行另一项全民基本收入试验,在 18 个月内为约 100 名斯托克顿居民无条件提供每月 500 美元现金,参与者必须居住在中等收入或低于城市中位数的社区,但对参与者的个人或家庭收入没有限制。^④

加拿大安大略省 2017 年下半年在汉密尔顿(Hamilton area)、桑德贝(Thunder Bay)和林赛(Lindsay)等地区的 4000 名低收入人群中开展了为期三年的基本收入试点项目(basic income pilot project)。根据该项目,年龄在 18-64 岁之间的单身成年人

^① Karl Widerquist and Michael W. Howard, eds., *Exporting the Alaska Model: Adapting the Permanent Fund Dividend for Reform around the World*,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p.243-250; Karl Widerquist and Michael W. Howard, eds., *Alaska's Permanent Fund Dividend: Examining its Suitability as a Model*,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p.3-11; Jurgen De Wispelaere, *An Income of One's Own? The Political Analysis of Universal Basic Income*, Tamper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33-35; Alaska Permanent Fund Corporation, "History of the Alaska Permanent Fund," <https://apfc.org/who-we-are/history-of-the-alaska-permanent-fund/>, last accessed on 6 January 2019; 另参见周建军、黄胤英编译:《社会分红制度的历史考察:阿拉斯加的经验》,载《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比较》,2006 年第 3 期。

^② Amy Downes and Stewart Lansley, *It's Basic Income: The Global Debate*, Policy Press, 2018, pp.181-184; Y Combinator Research, "Basic Income Project Proposal: Overview for Comments and Feedback,"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99c23b2e6f2e1aeb8d35ec6/t/59c3188c4c326da3497c355f/1505958039366/YCR-Basic-Income-Proposal.pdf>, last accessed on 17 January 2019.

^③ "An Ambitious Basic Income Experiment Started by a Major Silicon Valley Tech Accelerator Has Been Delayed," 27 August 2018, *Business Insider*,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basic-income-experiment-started-by-y-combinator-delayed-until-2019-2018-8>, last accessed on 17 January 2019.

^④ "Stockton, CA, US: New Details Revealed in Planned Basic Income Demonstration," 23 August 2018, Basic Income Earth Network, <https://basicincome.org/news/2018/08/stockton-ca-us-new-details-revealed-in-planned-basic-income-demonstration/>, last accessed on 15 January 2019.

每年最高可获得 16989 加元,夫妇最多可获得 24027 加元。残障人士将额外获得 6000 加元。这些金额的确定是基于安大略省 2016 年的贫困线 22653 加元,贫困线标准的 75%即为单身成年人每年可获得的基本收入,而贫困线相当于该省中等收入的一半。参与者可通过工作增加他们的总收入,而每赚取 1 加元,获得的基本收入就会减少 0.5 加元。例如,一个人从兼职工作中每年收入 1 万加元将获得额外的 11989 加元的基本收入(16989 加元减去 5000 加元),总收入为 21989 加元。因此,单身成年人年收入低于 34000 加元才能获得资格,夫妇则要低于 48000 加元。政府希望探讨为目前生活在低收入阶层的人提供基本收入的有效性,无论其是否工作,同时希望该项目能帮助确定这一简化的收入支持计划能否改善弱势工人和社会救助者的健康、教育和住房状况,了解低于收入水平的保障是否会降低就业预期。^① 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这一试点项目并非完全无条件的,而是属于有条件的部分全民基本收入模式。

不仅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全民基本收入也引起广泛讨论并引入实践。2011-2013 年,印度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资助下进行了两项基本收入试验。结果显示,无条件的现金收入对贫困家庭产生了显著影响,改善了他们的整体状况。^② 在 2019 年大选前,莫迪政府准备推进全民基本收入计划,以保证贫困阶层的固定收入。^③ 而印度锡金邦已经宣布将在 2022 年试行全民基本收入制度,将向该邦全部 610577 名公民无条件提供现金补助,这是迄今规模最大的全民基本收入试验。^④ 印度作为拥有 13 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为应对社会保障资金转移低效、贫困和不平等问题,在全民基本收入上的探索正逐步走向深入。

当前,全民基本收入已经由学术理念逐渐走向政策实践,在全球范围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思考。由于在分配方式上的激进性——无条件的现金发放,全民基本收入在政治上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所以愿意尝试的政府仍保持着相当程度的谨慎,以渐进的方式在推进。现有的政策实验和实践大多离原本意义上的全民基本收入还有很大的差距,多数采取的是部分的和混合式的制度安排。这也说明全民基本收入在政策实

^① “Ontario Launches Basic Income Pilot for 4,000 in Hamilton, Thunder Bay, Lindsay,” 24 April 2017, Toronto Star, <https://www.thestar.com/news/ontario/2017/04/24/ontario-launches-basic-income-pilot-for-4000-in-hamilton-thunder-bay-and-lindsay.html>, last accessed on 30 July 2018.

^② Amy Downes and Stewart Lansley, *It's Basic Income: The Global Debate*, pp.136-140.

^③ “Modi Readies Basic Income Game Changer for 2019,” 29 December 2018, *Sunday Guardian Live*, <https://www.sundayguardianlive.com/news/modi-readies-basic-income-game-changer-2019>, last accessed on 16 January 2019.

^④ “Tiny Indian State Proposes World's Biggest Experiment with Guaranteed Income,” 18 January 2019,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19/01/17/tiny-indian-state-proposes-worlds-biggest-experiment-with-guaranteed-income/?utm_term=.41c4ba8bd0a5, last accessed on 23 January 2019.

践中正在形成制度多样化的过渡模式。^①

四 进一步的讨论

全民基本收入给传统观念带来的冲击至少在三个方面为进一步的讨论留下了理论空间。第一,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全民基本收入主张的“不劳而获”是否能够成为新的劳动伦理,赋予社会公平新的内涵?有劳才有得是人们的惯常认知,但是全民基本收入使得任何一位国民都可以无偿从政府收到一笔固定收入,事实上可以不劳而获。在传统劳动伦理视角下,这无疑是奖励懒惰、惩罚勤奋,是不公平的。所以,全民基本收入首先意味着对“社会公平”内涵的重新审视。全民基本收入的设想是通过一笔无条件的“人生启动资金”,缩小市场竞争的成功者与失败者之间命运的巨大鸿沟,而不是简单地将个体区分为“勤奋工作者”和“福利乞讨者”。在全民基本收入视角下,公平社会的核心要素是让人更多基于自身真实意愿进行选择。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社会制度,但仅仅依靠市场中的公平竞争并不能带来这样一个社会。在进入市场经济这个竞技场之前,每个人初始禀赋的差异对之后各自在市场中的表现至关重要。个人的收入分配绝不仅仅是按照个人的自由选择和努力来分配的,诸如运气、家庭出身等非市场的因素甚至起更大的作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虽然在学术传统上一直是自由市场理论最强有力的倡导者和辩护者,但其元老级人物弗兰克·奈特教授有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一个人是穷人还是富人,主要取决于出身、运气和努力,但这其中最不重要的因素就是努力。奈特的论断虽然比较极端,但他想强调的是,“出身”和“运气”这两类偶然性和随机性因素会对个人收入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恐怕难以否认,“出身”所代表的由家庭背景决定的外形特征、财富传承、教育培训和社会关系等“天生”的初始禀赋,是决定个人努力最终能否在市场上取得良好收入的重要力量。而“运气”代表的就是市场上无处不在的不确定性。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出身”或是“运气”本身是不公平的,但由此导致的财富分配结果和积累方式的制度化和代际间传承的固化,却是不公平的。公正的制度要能缓和“出身”和“运气”这类偶然性因素对个人在社会结构中地位的影响。^② 无条件基本收入的

^① 金炳彻:《基本收入的学理构思与模型研究》,第35页。

^② 参见杨春学:《和谐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基础》,载《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第30-40页;另参见赵柯:《每月无条件发钱,芬兰可笑吗?》,《新京报》2017年1月10日。

理念就是要通过这笔无条件的现金收入,缩小每个人初始禀赋的差异,尽可能缓解“坏运气”对个人自由选择和能力发挥的束缚。

传统的社会公平观认为,机会平等是核心,追求结果公平反而会制造新的不平等。全民基本收入的理论出发点恰恰是结果公平,认为没有一定程度的结果公平作为基础,机会平等只会放大和强化那些初始禀赋本就具有优势的个体的竞争地位。按照阿特金森的说法,不能认为只要能为人人生这场赛跑打造出公平竞争的赛场,就不应再追究其结果,完全忽视发令枪之后的事情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个人可能会付出巨大的努力,但因运气欠佳而一败涂地;并且即便所有人都有机会参与公平竞争,但竞争胜利者得到的奖金并非按人头平分。很多时候各奖项之间的奖金差别是巨大的,而这种巨大的差别往往是特定社会结构下的有意结果。当前的结果不平等会影响下一代的机会不平等,今天不平等的受益者会将其资源转移到子女身上,使他们拥有天然的优势。如果我们对明天的机会平等有所担忧,就必须关注今天的结果不平等。^①

第二,从经济效率的角度看,全民基本收入将不平等视为经济增长的对立面,以无条件的均等化转移支付来改善逐渐扩大的不平等,将平等作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这是否能重新理解不平等与增长的关系提供新的思考方向?传统经济学理论并不认为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反而将不平等看作促进增长的积极因素,具体有三个机制:^②首先,富人比穷人有更强的储蓄倾向,而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来自储蓄,那么自然而然,有利于富人的收入分配制度将会加剧不平等,但社会的储蓄总额会增加,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其次,投资需要一定规模资本的聚集和积累,特别是一些创新项目,因为蕴含更大的风险,成本更大,也更需要大规模资本的支持,所以不平等的增加本质上是资本聚集的体现,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再次,避免道德风险。不平等意味着收入差距的拉大,这会形成对低收入者的激励,使其不会安于现状,而是积极寻找市场机会增加收入,进而让经济充满活力。

对不平等积极影响的过分强调,也构成了近年来流行于西方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重要内容。这对现实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具体体现为各类或显性或隐性的倾向于富裕阶层的收入分配制度。这些制度导致贫富差距日益加剧,阶层固化日益明显,代际不平等日趋强化,成为摆在下层民众面前的一道道不可克服的屏障。^③ 再加

^① [英] 安东尼·阿特金森:《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王海昉等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0-11页。

^② Philippe Aghion,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Growth Theories," pp.1619-1621.

^③ [法]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88页。

上移民涌入造成的社会问题,为民粹主义者向失望民众“兜售愤怒”开启了大门。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一股政治力量,民粹主义最为本质的内涵是“人民与精英之间的冲突”,^①反对既有体制、反对当权精英、反对主流政治,核心是以对抗政治来代替妥协政治,以“民意至上”来压倒“政治多元”;因为在当下的制度中,人民在财富、资源和机会分配中备受忽略。这造成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分裂,为政治危机发出预警信号;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已不再起作用,应尽快修补。^②民粹主义的兴起使得西方社会的经济理念开始发生变化,虽然西方经济学界现有的研究并未对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性质给出一致的结论,无法在理论上给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明确的依据,^③但以往奉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为圭臬的IMF、OECD已经不断地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提出预警,并且非常明确地将平等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力量,把“社会凝聚力”这一政治社会学的概念作为重要变量引入对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分析中。^④全民基本收入显然是以平等为价值取向的制度设计,为我们重新理解平等与增长的关系,提供了有理论价值的实践。

第三,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看,全民基本收入通过让社会福利与雇佣劳动“脱钩”来应对科技进步带来的大规模失业,这是否意味着以雇佣劳动为基石的传统生产关系会逐步走向瓦解,进而需要重新定义“工作”的方式、内涵和价值?全民基本收入本质上是一种政府与国民之间的新型社会契约,它改变了政府与国民之间“以纳税换取公共服务”的传统权责关系,扩展了政府对国民进行社会保护的责任边界,是在科技进步造成市场与劳动者之间纽带弱化的背景下,试图通过建立政府与国民之间的新型社会契约来重塑和增强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因为技术进步一方面会越来越多地淘汰现有的工作岗位,另一方面也将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准入门槛,这不免会造成一种社会风险:大量劳动力被排斥在劳动力市场之外,而劳动力市场被少数精英所主导。根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在可预见的未来,大约3600万美国人从事的工作可能实现自动化,至少70%的工作任务可能很快由机器来完成。随着人工智能加速进入

① [美]约翰·朱迪斯:《民粹主义大爆炸——经济大衰退如何改变美国和欧洲政治》,马霖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vi页。

② 同上。

③ 曾国安、洪丽:《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联机制研究进展》,载《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5期,第94-95页。

④ Jonathan D.Ostry et al., “Redistribution, Inequality, and Growth,” Kalpana Kochhar et al.,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Income Inequality: A Global Perspective,” *IMF Fiscal Monitor: Tackling Inequality*, October 2017.

市场,美国四分之一的工作岗位将受到严重冲击。^① 低薪工作面临的风险最大,在2016年向总统提交的报告中,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估计,每小时支付不到20美元的工作岗位中有83%可以实现自动化。仅在OECD国家,未来五年总共将淘汰约700万个工作岗位,但只会创造约200万个“新”工作岗位。^② 德国IT产业协会主席贝尔克(Achim Berg)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数字化进程,德国的电信行业工作岗位损失了9成。接下来可能面临同一厄运的还有银行、保险、化工和医药等行业,这些领域的工种数量20年后可能会减半。^③

正是在传统生产关系发生剧烈变革的背景下,重新确立国家与劳动力市场之外的“劳动力”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成为当务之急,许多来自硅谷科技企业的高管也支持全民基本收入,将其视为解决日益严峻的人工智能取代劳动力岗位的一种方法。马斯克在采访中表示,除了全民基本收入之外,他无法预见任何其他方法可以解决机器人取代劳工带来的问题。他认为,由于自动化会导致失业和经济产出增加,社会可能别无选择,只能将一部分资金平均分配给每个人。^④ “脸书”(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也是全民基本收入的支持者。^⑤ 随着科技的演变,有酬工作和生产很可能不再是社会的中心,基于传统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结构的福利模式在今天不再适用,因为就业、生活方式以及家庭结构正变得越来越灵活。全民基本收入拓展了有价值“工作”的范围和内容,因为它为无酬劳动提供了补偿,例如在家庭或非正规劳动部门的非市场型工作。因此,个体可以选择将不同类型的工作——有酬的、家庭的和自愿无酬劳的——进行“混搭”,甚至还可以将其与休闲活动结合,确保所有年龄段的成人在传统型工作、非传统型生产以及个人闲暇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⑥

① Mark Muro et al., “Automatio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ow Machines Are Affecting People and Places,” Brookings, January 2019,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9/01/2019.01_BrookingsMetro_Automation-AI_Report_Muro-Maxim-Whiton-FINAL-version.pdf, last accessed on 26 January 2019.

② Gerlind Wisskirchen et 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Workplace,” IBA Global Employment Institute, April 2017, <https://www.ibanet.org/Document/Default.aspx?DocumentUid=c06aa1a3-d355-4866-beda-9a3a8779ba6e>, last accessed on 27 January 2019.

③ Julia Löhr, „Digitalisierung zerstört 3,4 Millionen Stelle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0 February 2018, <https://www.faz.net/aktuell/wirtschaft/diginomics/digitalisierung-wird-jeden-zehnten-die-arbeit-kosten-15428341.html>, last accessed on 1 February 2019.

④ “Elon Musk Says There’s a ‘Pretty Good Chance’ Universal Basic Income Will Become Reality,” Business Insider, 7 November 2016,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elon-musk-universal-basic-income-2016-11>, last accessed on 20 January 2019.

⑤ “Read the Full Text of Mark Zuckerberg’s 2017 Harvard Commencement Speech on Success, Failure and Entrepreneurship,” CNBC, 26 May 2017, <https://www.cnbc.com/2017/05/26/full-text-of-mark-zuckerbergs-2017-harvard-commencement-speech.html>, last accessed on 25 January 2019.

⑥ Yuan Zheng et al., “Universal Basic Income: A Working Paper,” pp.13-14.

工业革命以来,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探索始终在劳动与资本、市场与民主以及自由与平等之间寻求平衡,这也是资本主义制度演变的内在动力。西方政治领导人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 1930 年代大萧条中吸取的教训是,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之间可持续的平衡会被过度的市场行为打破,因为民众不愿接受一种把所有好处都交给精英,而把成本强加给穷人的市场模式。在美国,时任总统罗斯福做出的回应是推出“新政”,试图用政府的力量驯服市场,不再把贫困仅仅视为个人失败的结果,承认这也是社会经济制度失败的产物。观念的变化使得罗斯福政府提高个人所得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支持工会与企业主谈判争取劳工权益。^① 欧洲则是 1945 年后在战争的废墟上开始建立“福利国家”和“社会市场经济”,这些推动资本主义制度“再平衡”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战后西方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到了 1980 年代,“里根革命”和“撒切尔革命”推动了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二次“再平衡”,向市场和效率倾斜,从而开启了世界经济将近 30 年的繁荣周期,直至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全民基本收入之所以在今天的西方国家引发广泛争议和关注,其背后所体现的恰恰就是在西方遭遇经济社会危机和新技术引发生产关系变革的形势下,围绕新一轮资本主义制度“再平衡”问题而进行的利益调整和观念碰撞。全民基本收入回归西方国家的“政策工具箱”,在相当程度上预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新一轮调整的方向。

(作者简介:赵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李刚,武汉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海洋)

^① 杨春学:《如何压缩贫富差距?——美国百年历史的经验与教训》,载《经济学动态》,2013 年第 8 期,第 4-13 页。